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八期 ——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08a)

---

- |        |   |     |
|--------|---|-----|
| 【劫后反思】 |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br>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上）            | 雷一宁 |
| 【史实辨析】 | 文革不反腐败  | 吴平祥 |
| 【书刊评论】 | 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读安舟<br>《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 董国强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劫后反思】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上）

• 雷一宁 •

很高兴，看到宋彬彬2012年1月改定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下文简称《想说的话》）（见本刊zk1202b——编注），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她没有停止思考；是因为她在文章开头就说“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很好。人有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灵魂者，思想感情也，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灵魂/思想感情决定的。

在文章的最后，她说：“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她的同学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下文简称《我看卞仲耘之死》）的最后，说：“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在追问。”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五人的访谈纪录《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节选）》（见《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8期，下文简称《另一种陈述》）里，访谈的主持者冯敬兰说：“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卞校长之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理清历史事件，让亲历者反思，让后人知晓，让历

史铭记，是我们的责任。”

将近60年前，我曾怀着“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理想，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文革中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愿和你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为了弄清楚师大女附中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为了不再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遇她们校长卞仲耘所遭遇的一切，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第一个问题：要武 / 红卫兵是怎样产生的？

叶维丽是研究历史的，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她同意“真相在细节中”的观点，并说“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真实。”在《另一种陈述》中，她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这段话说得简单明白点，就是“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产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导师、领袖或贪官污吏、杀人犯，概莫能外。这是1949年“解放”初期，在我们这代人中曾大张旗鼓地学习讨论过的问题。当讨论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后，这个理论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有重提它的必要。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比起别的孩子，你们更为幸福，生于红色家庭，长于红色大院（这个词组来自叶维丽写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题目《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这时间、地点、条件，使你们从小就受到父母、前辈“打天下者，坐天下”等等思想意识的耳濡目染；一连串的“运动”，更使你们体会到共产党和领袖 / 导师的“伟大、光荣、正确”，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切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这些在你《想说的话》中却很少叙述，只是说“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连雷锋对你们的影响，也只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王杰身上学到的也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还是先回顾一下有关的主要历史事件吧。

1951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对一个以行乞筹款办学校的人——武训进行讨伐，并由批武训，到批武训精神，到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开了批教育、批教师的先河。同时废除了于1931年就有的“教师节”（每年的6月6日）。“新中国”没有教师节，为虐杀教师埋下伏笔。

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从批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开始，展开了全国性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国开始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

1953、54年，改造思想的武器，即《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集出版发行。

1954年暑假，在高等院校中进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从此，自由思想的领地——大学也开始万马齐喑了。

1955年，从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引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同年，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学理论”开始，对种种“唯心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包括对教育理论和对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教育理论的批判。

这时，你们6、7岁，当然，不会参加这些运动，但是，你们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活着，

父母、长辈、亲戚等在运动中的地位及他们对运动的态度、言论等等，不会不影响着你们，熏染着你们。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详见刊载于《炎黄春秋》刊外稿中，雷一宁的文章《六十年来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

在你们进入学校之后，与教育（雷注：我在此文所谈的“教育”均为广义，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胎教等）、与你们的成长直接有关的历史事件就多了。

1957年，经过开头叫“整风运动”，后来叫“反右派运动”的运动之后，中国进入全国用一个脑袋思维，按一个脑袋发出的指示办事的年代。

这时，为了使你们成为共产党毛泽东所理想的红色接班人，在教育战线上、在学校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

57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政治思想工作……”

57年上半年，教育界在讨论教育中的继承问题时，指出：把教育看成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永恒”范畴，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是错误的……

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

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

1958年，随着“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进入大跃进岁月，运动更多了，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教育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小学生也不能例外的，如，在支援农业大跃进的口号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经常停课下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双抢”、“三秋”等农业劳动；大炼钢铁运动规定高小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致使教学工作基本停顿。在这些运动中，你们一定都是“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吧。

在紧接着（1959年）而来的批彭德怀的运动中，你们会怎么样？彭是毛的战友，理应“打天下，坐天下”，但他却不服从那一个大脑的指挥，硬要独立思考，要为那些挨饥受饿的平民百姓呼喊。这时，你们站在哪一边？……你们，生活在红色大院里，不会挨饥受饿，恐怕

不会站在彭德怀一边的。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发表社论。于是全国中小学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要学生从小养成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3月7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会后,各省、市在教育界、学术界等界开展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活动,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等观点。

1960年上半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再次出现大办教育的高潮,要把12年制的小学,缩短为10年,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为此,还把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乱批一通。你们一定是在这次运动中,小学没有读完六年就直接跳到中学的吧?

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2月,号召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教育运动,雷锋成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雷锋精神的第一条就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雷锋日记》成了青少年的道德教科书,书中几乎每页都有这样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的“四季诗”成了人们的“座右铭”,其中两句是:“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1963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3到64年,从批影响深远的《爱的教育》开始,在教育界掀起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批以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斯霞老师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后来连电影《园丁之歌》也遭了殃。斯霞认为,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这些思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提高到“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高度,还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好浓的火药味!这还仅仅是“序幕”,看来“更大的主力战”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可见毛早就策划好了,“文革”的突破口和主战场是在教育战线、在学校里。

1964年,《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红卫兵的标志和武器/行动指南——“红宝书”出来了(红卫兵的标志是:洗得发白的草绿军帽和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戴红袖章,手握红宝书),全国又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中小学跟得更紧,出现了“语录进课堂”、“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现象。

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在和毛远新（其侄子，当时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谈话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紧接着，不知是哪位很能“立竿见影”的干将，编写了一个大概名为《主课》的话剧，强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彩排演出。

时间刚进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但，在社会上却是批凯洛夫教育学，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批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电影《北国江南》……使人扑朔迷离，难道这就是“更大的主力战”？这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些人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原来，这一切都是为批吴晗的《海瑞罢官》（11月30日）鸣锣开道，那便是文革的开始了。

以上所述，是你们16岁之前的有关历史事件。至于那概括了“要武”的精神的、红卫兵使用频率很高的两句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所共知，前者早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提出；后者是在“反右运动”初期提出，并都摘录于“红宝书”中了。

进入1966年后，又在教育战线上执行一些举措：

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5月7日，毛泽东审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时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简称“五七指示”）。8月1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说：“因文革……从本年起，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7月25日，教育部发《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

在这段时间，紧跟党中央、毛泽东的“精英”们，还编造了许多充满谎言和暴力的艺术作品，以形象化的手段来熏陶你们，感染你们，如，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电影和泥塑群《收租院》；如，大地主周扒皮的故事《半夜鸡叫》等等，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爱的教育”理论，“恨”战胜了“爱”，在你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全句是：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种子。

这时，你们十六七岁。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十六七岁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又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叛逆”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是通过分析他人，逐渐从周围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过分析自己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说过，人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这时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这些都是客观的生理、心理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种运动和变化，使他们象冲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横冲直撞，忽而蜿蜒潺湲，忽而无缘无故地放慢流速，忽而又像瀑布一样奔腾咆哮……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意识的，也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关键就在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和引导（详见半月刊《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

这些年，社会、学校、家庭、尤其是那个马克思所说的“别人”，就是为你们的成长提供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你们这些祖国花朵的生命激流，就是沿着上述他所安排好的河道奔流的，你们就是这样渡过你们生命的危险期的。

这段时间你/你们的表现，在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的“荣誉校友”的光荣榜上，有关于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热爱学习”，可能是真的。但“爱”是有阶级性的，你热爱的是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所肯定的学说，毛泽东所否定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学说，你绝不会爱学也没有可能学，如，“爱的教育”等等学说；“尊敬师长”那就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了，随着教师一步步沦为将要被打翻在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你的尊敬只能一步步减少，最终荡然无存；“严格要求自己”也是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就是明证；“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也是真的，因为那些社会工作/运动都是毛主席号召的。不过，评语所写都不具体，空洞的抽象掩盖了具体的实际。

这些年，你们已由一个幼稚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满脑子“毛泽东思想”的少年，“头上的角”、“身上的刺”，已经在你们充满躁动的生命中孕育、发芽，“要武”已经产生，正在等待着合适的时间、地点、条件来举行“加冕”典礼，这加冕典礼就是8·18，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二个问题 八月五日那天师大女附中是否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在工作组撤出之后，学校里不存在一个“权力中心”；《另一种陈述》中，刘进说，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真的如此吗？还是先看一下8月5日前毛泽东的活动：

1966年2月，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借着想做女皇的江青之口提出“黑线专政论”。

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干掉了刘少奇司令部的一员大将彭真，解散了“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和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并起草了大规模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下，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了出来。当

聂元梓等人遭到围剿时，康生派专人密告坐镇武汉（一说杭州）的毛泽东。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红卫兵组织。

6月1日，身在武汉的毛泽东电令向全国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天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烈火迅猛燃烧。聂也因此成了有名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之首，尽管她当年已45岁，可以当红卫兵的妈了。

6月2日，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还刊登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出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进入狂热状态：中央派驻的工作组被轰走了，各校党委的一、二把手成了黑帮分子，批斗出现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脸上涂墨、搞“喷气式”和游街示众等暴力行为。

是什么使毛泽东下令公开这张大字报？一个月后，他如此解释：“‘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见谭放、赵无眠选辑的《文革大字报精选》第27页，明镜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可见，毛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来做他的马前卒。

6月18日（一说17日），毛泽东秘密跑到他故乡韶山的滴水洞，在那里写了一封给江青的长信，修改好后于7月8日发出。此信当时是不公开的，但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民间转抄、传播。信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解放后，毛泽东17次游长江，这是最后一次。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他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这半年，毛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遥控”革命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刘、周、邓等就派工作组问题向北京市师生员工代表作检讨。之后，宣布撤消他们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在这次有许多“革命师生”参加的大会上，毛“突然”出现。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学生/红卫兵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烈称赞他们的作为是革命行动，江青也热情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小太阳”。于是，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在京城学校里出现。

这些事情说明几点：

第1，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究竟产生于何时？

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7月底前，最迟迟不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那天，那于7月31日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便是。这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血统论等一系列事件催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依靠的“革命师生”组织，和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一样，其最高领袖 / 司令就是毛泽东。硬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叫“主义兵”，不是红卫兵，那是诡辩！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接着还来了一个诡辩：“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八月五号已经存在。”上面的证据还不够？那么请看《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 2007 年证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再看，你们的同学，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话：

“（7 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邓榕不仅自称“红卫兵”，还参加了这次大会，你 / 你们呢？

“8 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你们谁说的不是真话？拷问自己的灵魂 / 扪心自问吧！

至于说这是“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也许当时确实如此，但是，共产党、毛泽东的教育 / 教导早已把你们拧成一股绳，使你们嗅到《炮打司令部》散发出来的火药味时，能够“立竿见影”地起来实施暴行、宣扬暴力。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也说：“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八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整个文革期间，红卫兵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组织，其内部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矛盾，还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时还是真枪实弹的。可是，无论哪一派，都高举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号。

你们硬要说女附中的红卫兵产生于 8 月 8 日筹委会成立之后，目的只是为了证明 8 月 5 日那天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无关罢了。且看你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改名换姓（指把‘学代会’改为‘筹委会’）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地管理学校事务”。在《想说的话》里，宋彬彬说，“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在另一处又说，“8 月 19 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这些说法，不是完全证明了“筹委会”和“学代会”只是两个换汤不换药的



东西吗？况且它只存在了十天！因此，到底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筹委会”，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有人说，“（这）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说得对。

第2，8月5日前，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吗？

请看你们自己陈述的过程：

6月2日，女附中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作者是刘进、宋彬彬等三人。这三人就相当于女附中的聂元梓等人，这就意味着，象聂元梓成为北大的新领导那样，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将成为女附中的新领导。

6月3日，又有几位学生贴出题为“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的大字报，内容是欢呼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于是高中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初中同学满操场乱转。见《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一文。这证明高中同学是有组织的，而你们自己说的与此相反。

6月4日，团中央组成的工作组进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刘进和宋彬彬是“学代会”的正、副主席。“学代会”取代了原校领导，成为新的权力核心。这时，学校的“权力核心”是工作组+学代会。

6月21、22日，在工作组主持下召开了揭批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的大会，毫无疑问，这是由“工作组+学代会”领导的。会上出现了暴力行为。下面是当时卞仲耘写给上级的一封信中的话：“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请注意，这种暴力行为，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之后早已经出现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宋彬彬和少部分同学留校参加老师的集训。

这“军训”和“集训”应当是“学代会+工作组”部署的吧？目的是什么？达到了没有？参加军训的同学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另一种陈述》中还说：“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这“有问题的”又是指什么？军训由谁负责？是谁命令你（宋彬彬）留校参加老师集训的？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结束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在你们写的文章中都没有交代。

7月30日工作组撤出学校，7月31日就产生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这表明“红卫兵”立即取代了工作组。这时的“权力核心”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刘进和宋彬彬“一身二任”，肯定是当然的头头了。

8月1日，在《想说的话》中是这样说的：“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没有说明是谁命令他们返回的，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吧？

从这些叙述看来，上述时间都不是“权力真空”。但是，从军训同学返校时起，你们的叙述出现了分歧和“真空”。请看：

你们的同学陶洛诵的说法是，“8月1日，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这“突然”二字就是叶维丽文中要求“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的“细节”，为什么你们不用“突然”二字？

为什么要比计划的时间早地“突然被召回”？召回的目的是什么？召回后的这几天，你们做了什么工作？搞了什么活动？为什么仅仅4天，就发生了卞校长被打致死的事？你们都没有说明，而这几天的活动是了解“卞仲耘之死”的关键。

请接着第二个问题的开头，继续看毛泽东在称赞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后的活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由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领导阶段，进入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阶段的标志。为了显示这“群众造反阶段”的开始，在毛的精心策划下，参加全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非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47名恐怕连党员也不是的“革命师生”！这47名师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造反人马，他们在会上喧宾夺主，对刘少奇一伙步步进攻，迫使刘一再退却。请注意十六条中的有关条文：

第1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是“斗垮”，与一年多前在“二十三条”中的提法不同了。

第2条，有这样的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注意，是“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这些“革命青少年”当然呼之欲出了，在这次全会上就坐着47名这样的“革命师生”！

第4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这是在你们的“反思”文章中反复使用的词语。

第10条，再次强调前不久提出的“五七指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

第16条即最后一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月4日，就在全会召开期间，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8月5日，也是在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突然”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怀仁堂的走廊上贴出炮口直指刘少奇司令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方面，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方面，公开向已经表示投降的刘少奇司令部宣战。

8月17日，毛的大字报《炮的司令部》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

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你们听了/看了《决定》上的这些词语，又知道毛主席不仅请来47名“革命师生”参加全会，还在同一天肯定了两个月前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革命行动，你们当然会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把军训的同学突然召回，成立红卫兵组织，学习文件，领会上面的精神；于是，在毛泽东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同一天，你们以向女附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卞仲耘开火的实际行动，为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鸣响了礼炮。这时，是“权力真空”吗？NO！你们是“通天”的，“权力”来自上面的“天”！

是这样吗？拷问你们的灵魂 / 扪心自问吧！

第3，再看8月5日那天是不是“权力真空”？

先看你们的陈述：

8月5日，在毒打卞校长的六七个小时中，宋、刘都不在现场，可是不断有低年级学生去向你们（而不是别人）汇报情况。——这是按照你们一贯的领导方法去做的。在《想说的话》中，你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

人死后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出来收尸并签字，紧接着又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去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

第二天又是刘进（而不是别人）在全校广播通报此事，并要求全校学生注意保密，不得外传。

名正言顺，当时有资格做出这一系列举动的就只有上面说到的“权力核心”，即学代会+红卫兵。这“红卫兵”到底是谁？众所周知，她必须具备下述条件：必须是高干子弟，尤其是那些享受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既得利益的高干子弟；必须是党员；必须是最高年级（即高三年级）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这是知名校友“光荣榜”上对宋彬彬的评语，因此打上引号）……暂时想到这些了，不过，这差不多也够了，这“权力核心中的红卫兵”非宋彬彬、刘进莫属。

在你们的陈述中有几个地方令人质疑，你们必须拷问自己的灵魂 / 扪心自问：

（1）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八月五号当天她们（宋彬彬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在《另一种陈述》里，刘进说，在“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众所周知，在当时，尤其是“血统论”出来之后，与“权力核心”不沾边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进入工作组的办公室的，在里面的一定是与“权力”沾边的高干子弟。关于这一点，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说：“‘血统论’的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刘进说：“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主持人 / 冯敬兰说：“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这样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都“清谈”些什么？能“清谈”些什么？

这时的时局，变幻莫测：7月8日，毛发出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长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在武汉第17次畅游长江。众所周知，毛泽东“解放后”共17次游长江，事后都会掀起一股“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真实的游泳及比喻性的象征性的游泳）的热浪，这次也不例外。他游完之后，人们就在悄悄议论：又要有什么运动了！两日之后，即7月18日，毛突然从武汉返回权力核心的北京。7月29日，毛突然地出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8月1日，毛邀请47名“革命师生”，参加了只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才能参加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一天，女附中参加军训的同学突然被召回。今天，8月5日，毛突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直对刘少奇开火了。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应当向什么开火呢？他一再教导：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生活在红色大院的你们，是“通天”的，正如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所说，“这所学校集中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这时，你们围绕“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的议题，必然“清谈”些什么？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后半句应当稍作修改：“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鼓励”。这时，你/你们是坐在“办公室”里，像毛泽东那样“遥控革命”，让低年级的学生/红卫兵‘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呢！

（2）你们说，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是为了抢救。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还说“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仿佛这是敢于负责，是关爱，是同情，是怜悯！如果真是这样，低年级的学生第二次来向你们报告时，你们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送医院抢救了。但事实是，到第三次你们才把她送医院！为什么？因为从下午二时，折腾到七时，人已经死了。

请看，《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卞仲耘）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这是女附中一教师于1966年8月8日2时写给卞仲耘丈夫王晶的一封信。

再看，有三、四个学生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学生指着卞校长对我们说：“你们的主子完了！”又有的学生看着卞校长躺在车子上口里吐沫，又说：“看她在装死！”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到垃圾台上去……我们不往垃圾台拉，我们拉到东楼总务处门口……我们问怎么办？没人敢负责。刘医生只是说送医院，但是没人出头送。没人负责，我们两个人怎能送去医院？我们就把人拉到东楼后面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子前商量，学生觉着人躺在车子上看着寒碜（意即难看），就叫我们用写大字报的白纸盖起来。……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这是《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中，王永海（师大女附中工人，文革中失踪）1966年11月27—28日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

卞校长竟是这样离开人世的！真是惨绝人寰 / 惨无人道 / 残忍 / 残酷……我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为好。我心好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而当时，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你 / 宋彬彬是怎样表现的呢？请看王晶先生保存的《宋彬彬 66 年 8 月 5 日的谈话纪要》：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已快黑了，记不清了。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这是宋的《谈话纪要》中与卞仲耘之死的有关部分，词语、段落、标点（包括省略号、破折号）都与原件相同，原文就是这样语焉不详的。不过，字里行间看不出你有一点点对卞校长的负责任、同情或怜悯，倒有企图诱过于客观原因及他人的用心。

写了许多“怕”，只有一个“怕”没有写出来：人死了，你们怕了，终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的传统，何况这是文革中第一宗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有了这个先例，以后打死人就如捏死一只蚂蚁那样了，不但无需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如果你们既没有参与打人，也没有领导或纵容，怎么会怕呢？后来吴德对你们说“别怕”，也证明你们确实怕了。

把卞仲耘送医院“抢救”，是为了以抢救的假象，掩盖不抢救的真实，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拷问自己的灵魂 / 扪心自问吧！

（3）根据你们的陈述，在你们向吴德汇报后，吴德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第二天刘进向全校广播了此事，包括“死了就死了”这句话。

但是，据说广播内容与你们自己的陈述有所不同，请看王晶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这是 1967 年 4 月 23 日，宋淮云回忆 1966 年 8 月 6 日上午刘进的广播讲话的材料，原件为手写的影印件：“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可见，当时女附中确实存在一个“权力核心”，而且是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强到可以自作主张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可见，说“‘要武’在 8·18 之前就已经产生，只是还没有加冕罢了”，没有错；可见，你们之所以要向全校通报，是要为自己洗清罪过，同时给你们所领导的红卫兵们鼓气。

（未完待续）  
~~~~~

## 【史实辨析】

文革不反腐败

• 吴平祥 •

退休后本来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练练字，听听音乐，或者到公园的幽静处练练气功，这样，也许更能延年益寿。可是，天生的秉性，闲不住，就像坊间有些爱看热闹的人——那里有人围一圈，就非要挤进去不可。我经常上网去挤一些热闹的博客，看看人们说了些什么。这不？《共识网》上一篇小文章，又让我唏嘘不已。

这篇让我唏嘘不已的文章是陶东风写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两年前，我在《共识网》读过一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走在历史的前面》的文章，我只隐隐感觉极左意识形态的存在。我是大学老师，经常跟学生接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那时国门刚打开，学生朝外一看，怎么跟人家差距这么大呀？1989年以后，学生开始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是自己的就业——大学生不包分配，自谋职业。近些年，有部分学生又开始关心国事、天下事，比如说“乌有之乡”，比如说“占领华尔街”，比如说“重庆模式”。有些学生还会在QQ上听一听我的看法。学生的正义感非常可贵，现在全社会缺的就是这种正义感！然而，学生也像四十年前我们一样——头脑太过简单。他们对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对社会两极分化打抱不平，我都理解。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对大跃进的宽容、对文革的憧憬，让我非常吃惊！这也许就是陶东风说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吧！

在社会分配极其不公、官员腐败不可容忍的现实面前，有些青年朋友出现了一种幻觉——似乎文革是反腐败的运动，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我经常听到有些年轻朋友这样问我：“打倒走资派不就是打倒贪官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不就是反腐败和反腐败么？”“文革中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就是破除官僚特权？”好，我以亲身的经历，谈一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 （一）文革“四大自由”其实没有自由

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四大自由”，也叫“大民主”。“四大自由”真有自由吗？“大民主”是真的民主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字报上出现的一副对联，赞成这副对联观点的当然是我们现在说的“官二代”，当时，北京工业大学有个学生叫谭力夫，他就是持这个观点，他在辩论会上的讲话，被整理成文，在全国影响很大。在这种“血统论”影响下，全国出现了抄家风，许多“黑五类”家被抄。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更有甚者，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譬如，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北京的一位中学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揭露这种反动的“血统论”。这篇文章现在来看，谁都会认为是正确的，可是，“中央文革”竟然将它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只因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评，对林彪的罪行进行揭露，为刘少奇及一些老师喊冤叫屈，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被处死。临刑前还割断她的喉管，不让她呼口号。

上述那些滥杀“黑五类”的策划者参与者，没有一个受到惩办。而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思想者被处死，根据什么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现在的年轻人只懂有个“大民主”的文革，不懂得文革还有个“公安六条”！文革期间，貌似民主，实则专制，更恐怖的专制。文革是典型的人治，1967年“720事件”，江青发话“揪军内一小撮”，红卫兵稀里哗啦都往各大军区冲，全国大武斗也由此升级为真枪真炮。过了几天，江青又出来传达最高指示：“还我长城！”说是王力、关锋、戚本禹鼓动冲击军队，王关戚便成了替死鬼。受“公安六条”保护、头上闪耀着光环的“中央文革”大员们的命运尚且如此，草民们还敢相信“四大自由”么？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民主加法制。就如篮球赛，运动员抢球传球，这是“民主”。但球赛要有规则，规则就是“法制”。文革既无民主，也无法制。历史的启示：要改变当今社会腐败和不公平的现状，也只能依靠民主与法制。

## （二）打倒走资派≠打倒贪官

“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本中。从这个名词的出笼过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它的特定含义。

1957年“反右派”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谁也不敢再向领导提意见了，因为“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这样一来，有些农村基层领导人不受群众监督，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刘少奇以及几位大区书记认为农村问题非常严重：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还不止三分之一。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有38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因此，刘少奇认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所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事求是地讲，“四清运动”确实带有几分反腐败性质，但是，方法太左，太粗暴，不符合法治原则。

另一方面，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也开始反省大跃进的失误，并对1959年庐山会议有了许多新的看法。中央对地方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同时，为了渡过大饥荒的难关，采取了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一些措施。“三自一包”的确很灵，使很多地方少死人，渡过了难关。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过了头，否定了“大跃进”的功绩，是“翻案风”；“三自一包”是否定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单干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说，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单地说，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不是解决“四不清”问题，更不是反腐败问题，主要是解决“翻案风”和“单干风”问题。至于那些多吃多占贪污受贿的干部，检查得好，退赔就行，甚至于不退赔也行。毛泽东还认为，不但农村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也有，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十八个月以后，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非常明确：文革不是解决官员经济和生活上腐败问题，而是政治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文革初期，在炮打“走资派”中，偶尔也有提到腐败和特权的问题。例如，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贵重食品叫“燕窝”，就是从一份“刘少奇的食谱”的大字报中得知。但是，文革中的这种反腐败是极其有限的（当时的高级干部本身除中央赋予的特权以外，腐败行为并不多），而且中央文革一直强调“紧紧把握运动大方向”。什么叫“运动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凡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管他多么廉洁，都是“走资派”，都要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炮打的，即使他的身上有腐败问题，那也是“小节”！

### （三）反修防修≠反腐败

毛泽东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义在于反修防修，也就是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于是，现在就有一些年轻人天真地认为：那不就是反腐败防腐败吗？不是那么简单的。看官您听我讲下去：

这里说的“修”，指修正主义。那么，什么叫修正主义呢？这个词最早是在第二国际出现的。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早期、中期和晚年的文章是有变化的，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没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晚年的著作中也少提这样的观点。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中有人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去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提法。这些主张，被称为“修正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后来，连为马克思整理出版第三卷《资本论》的考茨基、最早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也与他们持有同样的观点。到底是列宁及第三国际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呢，还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更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代，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瑞典，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实现了马克思梦寐以求的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这种“修”值得我们反对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在揭露斯大林肃反错误和罪行的同时，结合当代国际环境开始重新审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同时在国内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而中共针对他们的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现在看来，文革所谓“反修防修”就是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根本不是反腐败和防腐败。苏联官员是有腐败的一面，但他们的腐败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不是赫鲁晓夫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腐败依然严重地存在。

高举“反修防修”大旗的文革，不但没能消除从苏联引进的特权（实际上也是腐败），而且滋生了新的腐败。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不见得就是腐败分子，有些人还是非常廉洁的。相反的，新上台的人不见得不腐败。靠造反起家的新贵，如王洪文、陈阿大、王秀珍们，就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搞腐败。1968年8月19日成立福建省革委会，其中有一名工人造反派出身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副省长），全省都知道他“五毒俱全”！军队介入地方，有些军队干部带头搞腐败。当然，当时经济很落后，不可能像现在官员一样数千万上亿地捞钱。说到这里，朋友们应当明白，文革所谓的“反修防修”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吧！

### （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官僚特权



文革中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颇能迷惑一些人，误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破除官僚特权”。

前文说过，中国官僚特权是从苏联引进的，但也不全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本来就存在官僚特权。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对特权制度还有一点警惕。但他不认为这种特权来自封建思想，反而硬给这种特权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毛泽东手下的秀才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抄来“资产阶级法权”一词（文革后重新翻译为“资产阶级权利”）。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认为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工资制以后，就有人“争名于朝，争利于世”，还是带有战时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好。张春桥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但他从柯庆施那里打听到毛的讲话精神以后，抢先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于9月15日发表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上。文章投到《人民日报》，该报编辑部不同意张的观点，未予转载。毛泽东亲自给《人民日报》主编推荐这篇文章并写了编者按语，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转载。这就给当时已经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火上浇油。

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一方面让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另一方面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张春桥心领神会，马上写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八级工资制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破除。姚文元笔杆一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就出笼了。用废除八级工资制来达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简直就是《红楼梦》里的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如果实行了，企业肯定大乱，国民经济顷刻崩溃。谢天谢地，这一次的“学习理论”运动没形成气候，一年后，毛泽东走完了人生路程，张姚也都成了阶下囚。

毛泽东精通辩证法，《矛盾论》也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是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素质的差别，能力的差别，等等。有些人只能胜任普通工种普通岗位的工作，有些人则可胜任特殊工种技术含量很高岗位的工作；有的人刚参加工作时只能胜任普通工种普通岗位的工作，但过了几年后就可胜任特殊工种技术含量很高岗位的工作。如果废除八级工资制，就意味着普通工种普通岗位可以跟特殊工种特殊岗位取得一样的报酬，这不乱了套？

所以，这里有必要将“级”的问题说明清楚：级、阶、品、位在中国古代都曾用过，基本上是身份的代表。如爵位制，公、侯、伯、子、男，代表的是身份，当然还有经济利益。再如品位制，官分九品，代表的是身份。张三李四同样是州官，职级（岗位）相同，但一个六品，另一个五品，身份是不同的。“级”与“阶”同样也可以代表身份，但也可能只代表职级，但有时也代表身份。例如民国时代的官级制和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官级制，一方面只是官级和工资级别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着身份，比如文革前的十三级，就是高干的分界线。十三级可以当副厅长、行署副专员，这是职级。但有些领导人的司机，也定十三级，这就是身份。就是高级干部的身份，有特供商品，有保健待遇，并享有许多特权。

西方国家除了少数国家保留王室的身份与特权外，其他人都叫作“公民”，有职务的高低但没有身份高低的区别。有些国家还保留爵位，但没有与实际的经济利益挂钩。

改革开放前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纯粹是技术级别、岗位级别，其身份都是工人，不存在身份的差别。我就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拿八级工资制说事？为什么不拿干部级别说事？十八年高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也无法说清一个与他自己有关的现象：张春桥和陈永贵、

吴桂贤同是副总理，岗位相同，按理说待遇也应基本相同，同工同酬吧！可是，张春桥享受高干待遇；陈永贵还由大寨大队记工分，享受农民待遇；吴桂贤是纺织女工，享受工人待遇。一起开会的时候，后二人连茶都喝不起（喝茶自己付费）！张陈吴职务一样待遇悬殊，这是什么“法权”？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如果说五十年代毛泽东对特权曾有过不满的话，晚年的毛泽东根本就不愿对特权开刀。有一事足以证明这一观点：1974年“批林批孔”中，江青树了一个“反潮流英雄”——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钟××。钟××在农村只劳动了3个月，于1969年初占用一个社员的征兵指标参了军。在当了3年兵之后，因父亲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很快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在“批林批孔”中，钟××反省自己，认为应“向一切剥削阶级自私自利意识形态开火”，“向特权思想挑战”，“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自我批判”，提出退学要求，从大学退到部队，又从部队退到农村，一路退到底，最后退到农民身份为止。

文革中，军队“支左”介入地方，凭借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属招工、提干、上大学提供方便，已经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在这个时候反“走后门”是大得人心的。但没多久，我们就听到正式文件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大意）：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形而上学猖獗”，“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当时听文件传达的人都觉得非常奇怪：这是那个曾经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毛主席该说的话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不是辩证法，是忠奸不分的诡辩论，等于诏告天下人：靠贿官买官当官的不一定是坏人，靠真本事考上去的不一定是好人！

后来，传说这一“最高指示”的背景是：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三），江青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提出“批林批孔”要结合实际，就是要批“走后门”，点了叶剑英的名，提到叶走后门将儿子送到空军当飞行员，将女儿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学外文。会后，叶剑英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毛阅后马上叫停：“谁没有走后门，我也走了。我也是把几个女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了嘛。”……据某些电视剧故事：毛泽东刚进入中南海的时候，包括杨开智在内的许多亲属都想通过主席介绍工作，都被拒绝——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知杨开智们听了伟大领袖的“谁没有走后门，我也走了”，有何感想？

这一“最高指示”实际上是让“走后门”合法化，使腐败风气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使全中国泡在拉关系走后门的祸水之中。八十年代有人说“还是我们的子女可靠”，让名门望族都推一个当“第三梯队”，大概也就顺理成章了吧！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跟反腐败毫不相干。正因为文革不反贪官，文革结束以后，好官贪官一起平反，贪官更贪，好官变成贪官更不足为奇。

□ 原载《共识网》

~~~~~

【书刊评论】

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  
——读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 董国强 •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教授安舟(Joel Andreas)是当下十分活跃的美国“新左派”学人之一。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一书，是他集数十年之功的研究成果。

概要说来，《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试图通过对1949年以来清华大学校史的微观实证研究，探讨共和国时期中国社会“新阶级”和“技术官僚治国”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回应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

为了阐释所谓“新阶级”和“阶级权力”的广泛社会基础，作者借鉴了Bourdieu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大量运用了“社会资本”（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特定党派成员身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文化资本”（基于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资本”（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等概念，以及与这三大“资本”有着直接对应关系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等概念。不过由于1950年代前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使得以“经济资本”为权力基础的“经济精英”不复存在，安舟在本书中集中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社会精英”与“文化资本”/“文化精英”的复杂互动关系。其次，鉴于1949年以后中共对社会事务的全面有效控制，以及“党员”身份认同对个人事业发展的特殊意义，安舟径直将Bourdieu的“社会资本”概念简化为“政治资本”，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精英”也特指那些出生于工农阶层、在解放后掌握各级政权的中共党员干部。同时，为了区别于旧时代的“政治精英”，安舟还经常采用“新精英”的概念来界定这个社会群体。

该书340多页的内容既包含较为详实的实证研究（主要见于十一章正文），又包含思辨色彩极强的理论申论（主要在“序言”、“介绍”和“结论”部分），就实证研究部分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为了更好地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体系，作者特意选择了中国的清华大学作为实证考察对象。众所周知，因其特有的历史、地缘等诸多因素，清华大学确实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意义。无论是19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鸣放一反右”运动，还是1960年代的“社教运动”、文革运动，还是1970年代前中期的“教育革命”运动，还是“后文革”时代的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发生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故事都同时兼具普遍的共性特征和特殊的典型意义。其普遍的共性特征，主要源于它作为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下的一个“单位”而存在的事实。其特殊的典型意义，则主要源于这个“单位”内部的成员构成主体是“知识分子”——其中既包括一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文化精英”，也包括一批又一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红色工程师”。因而，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这两个社会群体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这两个制度因素的四维互动，不但在论述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别开生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第二，作者对1949至1957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使我们对1952年前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和1957年的“鸣放一反右”运动有了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作者通过以蒋南翔为代表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体和以钱伟长为代表的清华教授群体之间的争斗故事，辅之以一系列数据和图表资讯，系统分析了建国初期“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社会构成、教育背景、生活情调、价值观念、教育理念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代人身上，只可能存在竞争、对立，而不可能实现融合。由此，一个长期以来人所共知的经

验判断，被安舟转化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

第三，作者对1957至1966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使我们对毛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转型、高校内部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和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红色工程师”的精神素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阅读该书有关章节，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清华校园中的许多实践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悖论。例如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共“政治精英”出于对旧“文化精英”的不信任，积极致力于培养自己的新“文化精英”——“红色工程师”。为了确保未来的“红色工程师”们的政治忠诚，当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通过高校招生政策的倾斜，有意识地增加工农子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比重。这种努力被安舟赞誉为反对精英主义、实现教育权利平等的一个有益尝试。然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状况是，清华学生群体社会构成的显著变化，并没有消除“清华人”们对精英主义观念的认同。再例如，共产主义革命所标榜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彻底消除官僚权威、人身依附和社会等级现象，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些“革命化”的制度安排——如在高校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招生问题上强调工农子弟优先，在奖惩机制中引入“又红又专”概念等——不但没有消除上述不良现象，反而使这些现象在清华校园中得到逆向的强化。作者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在所谓“又红又专”的评价体系中，“红”是压倒“专”的决定性因素。而所谓“红”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条件认同和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这种政治导向被贯彻到具体的奖惩制度中，一方面造就了“红色工程师”们的政治依附意识，另一方面造就了蒋南翔们在清华的绝对权威。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蒋南翔们在清华校园中的绝对权威，不过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威的一个缩影。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注定了“政治精英”在“文化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社会现实，实际上部分地解释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深层次社会动因。

第四，作者对1966～1968年间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初始动力和群众派性认同问题的概述与分析，是本书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在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一些模糊的乃至错误的看法，表明他对毛泽东个人、毛时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及其对社会公众政治行为的影响等因素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作者在具体描述清华文革运动的史实时，通过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和口述史料，揭示了中学生群体（清华附中）与大学生群体（清华大学）在造反动机和派性认同等问题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作者注意到，在清华大学名噪一时的“团派”与“四派”的两派对垒中，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个人追求等因素与人们的派性认同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必然的联系。这个发现无疑促使我们对西方学界至今盛行的“社会冲突理论”做出反思。我们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个人追求大体相似的清华学生群体为什么会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到底是他们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不同态度决定他们的派性认同，还是他们的派性认同决定了他们对上述两者的不同态度？为什么这些本性善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红色工程师”们不能通过文明、理智的方式消除不同政见，而要最终诉诸武力手段，使得象征精神文明的大学校园变成野蛮血腥的人肉屠场？不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给出怎样不同的答案，但其探求答案的过程无疑将大大丰富我们对文革期间群众派性斗争问题、乃至整个文革问题的现有认知。

第五，作者对1968～1976年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特别是关于“工宣队”和“工农兵学员”的角色定位与实际作用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文革运动后期群众运动的认知。作者在大力赞赏“工宣队”主导下的“三结合”权力模式在制约“官僚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工宣队”领导人本身不受群众监督的悖论。他还指出，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清华文革后期的群众运动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表面看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不过是一种所谓的sycophantic rebellion——即当时主流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造反精神”

和“反潮流”举动并不是民众真实意愿的自由表达，而是一般群众在政治高压的威慑下，为了取悦一些人而奉旨打倒另一些人。与此同时，在讨论“工农兵学员”作为一个新的“革命化”因素引入清华教育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忽略“工农兵学员”推荐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和腐败问题。

第六，作者对“后文革”时期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特别是关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和精英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描述，关于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精英”/“经济资本”的重新崛起的描述，关于在中国现有社会政治体制下可能出现的三大精英/三大资本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前景描述，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其最显著的例证是：伴随着老一代共产党“政治精英”（他们通常只占有“政治资本”）的相继凋谢，以“清华帮”为代表的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红色工程师”（他们同时占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中国政坛唱起了主角；其次，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理工科高校创办科技产业的热潮，中国出现了一批科技精英出身的亿万富豪（他们同时占有“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清华同方”的老总们和业务主管们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第三，伴随着“红色工程师”们在中国政坛的崛起，他们的子女们不但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开始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其他领域崭露头角（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占有了“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该书借清华个案的微观实证研究，考察当代中国“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两个群体和“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两个制度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所涉及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所汇集的各种材料和相关信息也很丰富和扎实。

然而该书理论申论部分的粗略与浅陋，同样令笔者印象十分深刻。安舟在“序言”中曾经提到，他的论述可能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其一是他对中共高层政治的情况不太了解；其二是他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太了解。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个因素确实造成了他认识上的重大偏差。此外，安舟作为一个生长于战后美国的青年学者，其特有的成长环境和个人阅历，使他对“铁幕”另一边的政治状况和日常生活缺乏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因而，他的某些“新左派”特有的论述，常常给人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观感。

举要说来，从该书的标题和目录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是该书论述的一个重点。然而作者关于文革的起因和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认同问题的探讨，却是该书最薄弱、最经不起推敲的部分。

例如按照安舟的解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运动的动机和他1957年发动“鸣放”运动的动机一样，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同时隐含着在中国消灭阶级差别的目标。这种看法的形成，显然是因为安舟完全采信了毛泽东自己在事前与事后的一些说辞。笔者认为，要判断毛泽东这样一位韬晦极深的政治家的行为动机，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不但要参考他自己的说法，而且要参考其对立面和旁观者的说法。正是基于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1963~1965年“社教”运动前后中共高层内部关系的连贯考察，不少学者已经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真实意图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详见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um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和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等论著）。

笔者想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战略构想，所谓文革不过是1942年延安整风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个翻版。只是当毛的意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挫败以后，文革的基本性质才由一场党内斗争演变为一场群众运动。然而中央（其实背后是毛泽东）对各地“造反”、“夺权”活动和“大联合”进程的强有力干预，以及“大联合”后各级革委会

中的权力格局,无疑都显示了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对精英主义政治的认同(详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China Quarterly, Autumn Issue, 2010)。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前提和精义之一是多党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社会公意的形成是多方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超凡魅力领袖的圣裁。然而文革期间伴随“大联合”而来的,是对文革初期自发的群众组织(或多或少地带有“政党”特征)的彻底取缔。这无疑是毛泽东有意扼杀“大民主”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因此,安舟在书中将文革期间的政策反复与1957年的“鸣放一反右”运动加以简单类比,把毛泽东说成“放”的积极倡导者和“收”的被动接受者,是令那些熟悉中共高层政治的读者们无法接受的。即使在1957年的故事中,也是因为毛泽东在5月间秘密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信,才使得带有政治民主化尝试性质的“鸣放”运动瞬间转化为卑鄙阴险的“引蛇出洞”策略。由此可见,安舟的整个解释体系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在逻辑上自洽,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故意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其次,安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文革后期(1970~1976)的群众运动其实是一种 sycophantic rebellion。在笔者看来,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主流传媒的大肆鼓噪而一度甚嚣尘上的“造反有理”、“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似乎表明了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决心。但是“公安六条”和“夺权”前后主流媒体社论对“组织性”、“纪律性”的再三强调,实际上又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造反者”的思想和言行。由此可见,在整个文革运动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听谁的话”、“造谁的反”的问题。只有合乎圣意的“造反”才是“有理”的。否则就不但“无理”,而且“有罪”!无论是文革初期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打压,还是文革后期对“造反派”头头的大规模清洗,都是非常有力的论据。其次,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尽管由于文革群众运动参与者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很难用某一种解释来涵盖所有人的参与动机,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体制中人”(不含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下乡知青、下放工人、下放城镇居民、城乡流氓无产者等“非体制中人”类群)看似“积极参与”的表象背后,不是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心认同,而是人们对极权政治体制的极度恐惧(详见Dong Guoqiang: The First Upris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Dynamics,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Autumn Issue, 2010)。在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表面看来人们似乎有着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但实际上不选择“参与”就意味着“反动”,就意味着沦为“政治贱民”。因此,安舟和其他一些“新左派”同仁对文革初期的民众政治参与作出很高的评价,至多是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一面。此外,安舟在书中提到的清华“团派”和“四派”成员在社会构成上的交叉性和重合性,也说明文革本质上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场上下互动的宗派主义战争。所谓“革命”不过是毛泽东及其御用理论家们构建出的一个神话。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安舟要想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别出心裁地在理论体系构建和实际论证过程中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也不应该无视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正如安舟在“绪论”中所言,各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背弃,并非发生于19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而是肇始于各国共产党“新精英”们掌握权力之时。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尽管所谓“新精英”绝大部分来自“工农阶级”,但一旦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工农阶级”中的一员,而成为一个“新阶级”。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并不因为他们是否与“旧精英”(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经济精英”)发生关系而改变。因此,安舟在理论申论部分大可不必纠缠于新、旧“精英”

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对立的”还是“融合的”，而是应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希望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达成民主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二，用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原有的不平等，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

事实上，安舟的实证研究部分已经十分清楚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